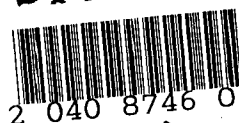




国际战略问题

陈忠经 著

时事出版社



国际战略问题

陈忠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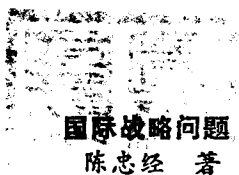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1987年

881007

GD85/13



国际战略问题

陈忠经 著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43 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09-002-7/D02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3225·043 定价: 2.10元

编 者 的 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国际战略问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本书的问世，可以表明在这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国际战略问题涉及广泛的内容，本书所论述的只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全书共分四章：在第一章《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中，作者解答了学术界近几年经常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弹能力”作了有深度的科学分析。作者在第二章中，用马列主义观点，阐述了我国国际战略原则和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点；这两章实际上是从主客观方面论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依据。第三章作者系统地论述了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发展变化，并着重对里根政府的战略意图作了深入的分析。第四章作者介绍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苏联战略思想的调整变化。本书不但具有科学性和理论性，而且论据资料博采世界之精华，有的是作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本书又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本书作者陈忠经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是我国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现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前所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前副主任。本书起笔于1986年春，正是作者70高龄的时刻；终稿于1987年初。作者仅用了一年的时光，就完成了20多万字的专著。这不仅说明了作者的水平和勤奋，而且也为国际

问题研究工作起了促进作用。作者特别希望编者说明：本书所有见解都是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及出版者。

我们相信这部国际战略问题专著的出版，一定会对有关研究及教学工作起促进作用，也将会有助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当代国际战略态势	(5)
第一节 “三个世界”	(6)
第二节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18)
第三节 世界和平与发展经济	(68)
第四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01)
第二章 中国的国际战略原则	(122)
第一节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122)
第二节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要点	(131)
第三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36)
第四节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144)
第五节 独立自主的和平对外政策	(150)
第三章 美国的世界战略	(152)
第一节 综述	(152)
第二节 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世界战略	(158)
(一) 不连续中的连续性	(158)
(二) 杜鲁门主义	(159)
(三) 艾森豪威尔主义	(163)
(四) 肯尼迪与约翰逊	(167)
(五) 尼克松主义与福特	(160)

(六) 卡特主义	(182)
第三节 里根时期	(187)
(一) 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187)
(二) 在混乱和矛盾交织的局面中不断形成和 发展的美国世界战略	(191)
(三) “战略防御倡议”	(215)
第四节 美国世界战略的根本弱点	(228)
(一) 根本趋势	(228)
(二) 在第二世界	(229)
(三) 在第三世界	(246)
第五节 “里根政府没有作出长期战略”	(257)
第四章 戈尔巴乔夫的“新的政治思维”和 苏联的世界战略	(263)
第一节 何谓“新的政治思维”	(263)
第二节 苏联的世界战略	(276)
(一) 西方的评论	(276)
(二) 苏联世界战略的指导思想问题	(292)

前 言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

中国对外政策的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究竟是什么呢？它和科学理论以及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些什么关系呢？这是值得认真理解和认识的一个大问题。我没有资格作什么代表性的阐述；只是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学生还有这样一个志愿：想要较广泛较深入地学习探索一下这个问题。这本书就作为一份只代表个人见解的研究报告。

要理解这样一个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客观存在的、当代的国际战略格局或态势，我们的战略环境，我们的战略思想、方针和目标，不能不涉及若干国际战略问题。

“战略”这个词，是日本人从英文的Strategy和德文的Strategie翻译过来的。一千几百年前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和将军们就用这个字，原是一个军事术语。“战略”这两个字，顾名思义，就是战争或战斗的方略、大略、或指导原则。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和1938年的几篇军事论著中，对于战略问题曾经作了精辟详尽的阐述。虽然当时他着重讲的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中的军事战

略方针问题，但是就在当时一直到现在，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远远超出军事领域之外。我们现在往往把“战略”这个词的含义使用得更广泛一些、更高一些、更大更深远一些，也就是着重使用其“政治”上的含义。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古往今来，任何战争都带有政治性，都有它根本的政治目的。同时，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然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战略的政治含义具有更高更大的概括性，它往往概括了军事战略、经济战略等等，或者扼其大要。中外战略家和战略学家早已用过“大战略”（Grand Strategy）这个词，还有其他一些名词，诸如“总体战略”、“整体战略”或“国家战略”等等，以别于纯军事战略；但是使用我们的语言，这种战略就是“政治上”的含义。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11月间和一位外国朋友谈及某一问题时说：“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考虑、也就是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到：“如果我能 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本书所提到的“国际战略问题”和“战略”，也就是着重它的政治方面和更概括的含义。

凡是“战略”，总要涉及一个“全局”，涉及一个“较长时期”的全局。一国或世界上某一个区域（如中东地区，亚太地区等等）可以是一个全局，全世界（甚至包括太空）是一个更大的全局。所谓战略或战略问题就是在政治以及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研究、掌握和运用现实关系中“较长时期的全局”的规律或指导性的规律。“国际战略”的意义，即可以此类推。

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也可以说一个较大的全局包

括了一些较小的“全局”），没有局部就无所谓全局；然而局部是隶属和服从于全局的。我们在战略问题上要认真分析、对待或处理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局部（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构成一个“战略单位”），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局部对战略全局的关系和作用；有无作用，作用的大小，时间的长短和时机，是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并且善于把许多局部综合、概括和运用到全局上来。反过来说也就是我们首先要胸怀长远的战略全局，从而评价、分析、考虑和对待或处理每一个局部，特别是较重要的局部。一个统筹全局的人，如果不善于处理全局和局部、长远和目前的关系，实际上忽视长远的战略全局，而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或迁就部分人甚至个人的一时利益，或者对一个局部（特别是重要的局部）作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估计和处理，目光短浅，“溺近迷远”，就事论事，因小失大，这样的人就称不上是一个真正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具有雄才大略的战略家，而至多只不过是一个事务家、战术家或很不高明的“战略家”。就是一个担负局部责任的人，同样应该力求具有战略家的素养。既要“务于精纯”，又要“观其大略”。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的“包围和反包围”一节中，曾经提到“世界性的围棋”一语，以譬喻战略和国际战略问题。一盘棋局，也有它的全局和局部，战略和战术。一个不高明的棋手，缺乏战略的全局观点，战略目标不明确，往往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迁就一时的得失，或者接受对手的故意挑动和引诱，“一触即跳”，这样尽管在战术上煞费功夫而到头来步步被动，所投下的棋子多不免是闲棋、废棋或死棋；一旦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下了一着关系全局的“败棋”，那就造成了中国俗语所说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局面。反之一一个高明的棋手，有明确的战略远见和全局部署，有统筹兼顾的胆略和决断，每一步棋都能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紧紧扣住战略目标，他就可以较多较顺手地掌握全盘棋局的主动权。举

个例子：记得几年以前意大利《共和国报》曾经发表过一条消息，说该报就意大利共产党人当时同莫斯科关系的“转折”一事，向正在纽约访问的意大利菲亚特公司董事长贾尼·阿涅利进行采访，征询美国政界、财界人士以及他本人对此事的看法。这位董事长先生最后回答说：“总之，一枚新的棋子放进了棋盘，这样自然就要迫使所有的人来重新考虑这盘棋的走法。”这话就说得有点意思。

“它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这句话中“长远的”这一点，究竟有多长多远？追昔抚今，我看少则两三年、三五年，多则十数年、上百年、甚至在某些领域，如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世界宗教问题上，可达数百年乃至千年以上。当然有些问题如果把时间摆得过长，与现实相距过远，那就接近于或甚至完全是属于理论范畴而不属于或基本上不属于“战略”范畴了。同时，这里所说的“长远的战略依据”以及战略和国际战略等问题，就要涉及“战略时期”和“战略转变”。在这一个战略时期中，往往就在孕育着下一个战略时期的“战略转变”或战略上的调整或补充。战略思想也是要随着客观实际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

我以为，学习和研究国际战略问题，不应该只是专门家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个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应该是每一个公民、至少是每一个涉外人员的事。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只要“涉”一点“外”，包括我们每一个留学生、各行各业短期出访或参加接待的人等等在内，不能只是埋头于专业，只注意一些事务或事务准备，而是要有点“政治”上的思想准备，胸中有个战略全局。这样，无论了解外国也好，宣传祖国也好，增进友谊也好，在种种涉外场合的待人接物中，就能高屋建瓴，使得思想境界和视野、工作作风、情趣和格调更高、更开阔一些，把工作也就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第一章 当代国际战略态势

国际情况在不断变化、发展。对于国际形势进行逐日（特殊情况下甚至逐时）的了解和观察是必要的。这当然会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一个时期内某一个地区问题或某一类事件的不断“重复”或重演，诸如黎巴嫩内部动乱频仍，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内外交织的各派枪战等等。对于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局外”的观察家来说，要从战略全局来考虑，对这些战术性的、偶发性的事件不必急于研究它的因果关系和影响，但要注意这些“琐事”的不断“量变”，注意每一个微小的或微妙的变化，以及看它是否成熟到可能导致某种局部的“质变”。另一种情况是在逐日的新闻中，出现了较重大的国际事件，这当然就更不能忽视了，可以结合平日长期的观察和资料的积累，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近期，短期（一两个月、以至一两年）乃至中期（四、五年以至十年左右）的观察研究同样是十分必要的，譬如我们从1986年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际环境将如何，我们就有必要作出一个大致的分析和估计。总之，中期、近期乃至逐日的观察都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这里要强调的是长期观察。就是要从过去历史的脉络，特别是战后40年的回溯，以至近期的观察，来对于未来20、30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一个大略的估计和判断。1985年岁末，我访问美国南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时，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政治管理系的贝奈特教授（Gordon Bennett）建议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似应更注意一些

长期的深远的探索。我认为他的建议是很有见地的。逐日观察当然是一个基础。对于国际形势的近、中期观察研究显然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政策的具体规划和运用上，要随着实际情况的不断发展而有所斟酌掌握，及时作出必要的反应。即如从战略上来看，三五年也有可能形成一个战略时期和战略演变，就至少要涉及我们某些具体政策的调整。然而我们如果忽略长期的更带根本性的分析和评估，不把眼光放得更大更深更远一些，我们对一个较长时期的战略全局的掌握就可能不那么稳定、准确，就会增加近、中期观察研究的局限性、或然性，甚至是盲目性，就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影响我们“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的信心和决断，就会使得我们的对外政策（当然也就联系到我们整个的国家决策）失掉了可靠的“战略依据”。这一章的标题是“当代”、而不是“当前”的国际战略态势，也就是这个意思。

第一节 “三个世界”

（一）

客观存在的当代国际战略态势，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直接的战略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

“三个世界”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是当代国际上一个长期的大态势，是当代国际战略态势的第一个要点。

不久以前，一位来华访问的欧洲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些人希望把世界划分为高度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这种划分多年来增加了世界的紧张；我们想缩小这种经济、技术差距，这样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这句话的后一半，说得好；前一半，至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高度发达的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客观存在，不是人们的主观“希望”所能随意“划分”的。至于世

界紧张形势的增加，也不能笼统含糊地说是由于这种主观“希望”的“划分”所造成的。如果说有人企图永远保持这种客观存在的划分，以便于极少数“高度发达”国家千秋万世欺凌压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那么这前半句话的含义自然又当别论了。

同样道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也绝不是主观臆造的，而是来自于客观实际的战略态势。

15世纪末、16世纪初哥伦布和阿美利果等人发现了新大陆之后，人们曾把欧、亚、非三洲称为“旧世界”，美洲称为“新世界”。这首先是从地理学的含义上来说的。至于由此对于“旧世界”特别是欧洲以及“新世界”本身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产生了什么影响，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自然界而言，地球作为宇宙间的一个星球以及亿万年以来繁衍其上的芸芸众生，可以说就是“一个”世界。就人类社会而言，在原始社会制度下的原始社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世界。从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从公有制进入私有制，从没有阶级和剥削到有阶级和剥削，特别是在不同地区先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之后，人类社会就实际上逐渐不成其为一个世界了。此后封建制度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非洲、美洲、澳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在许多国家的封建制度已经发展甚至趋于衰落的时候，他们那里才刚刚产生封建制，有的国家还处于奴隶制甚至原始公社制。全世界当中实际也就存在着不止一个世界。中国远在公元前约5世纪就进入封建社会，直到19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经济才逐渐变化、解体，长达两千几百年。但是就全世界范围来说，封建制居于统治地位大致是从公元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崩溃起，直到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止，长达一千二三百年来。接着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首先在英国发生了以蒸汽机为龙头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欧洲、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继进入了资本主义。到了1917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

社会主义国家。二次大战结束前夕，主要是战后，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大批殖民地、附属国脱离殖民主义的统治而获得政治独立。这样，除了这一大批新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逐步形成了另一个世界以外，人类社会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当时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一段情况为期不长，顶多不过十来年。历史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与由于种种历史条件形成的另一个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美国，一起称雄并相互争雄于全世界。“牢不可破”无法不破。资本主义体系既不可避免地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也无可避免地归于破裂。人类社会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出现了新的组合，当代的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态势：三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和实情大略就是如此。简单地勾画一个轮廓，无非是说一说当代的“三个世界”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偶然的，是全世界许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各种重要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究竟是哪三个世界呢？却又其说不一。

“第三世界”这个词，我们已经肯定而明确地用了多年了，但是它的发明权并不属于中国。作为一个新词，大致在万隆会议前后见诸书报，60年代以来大为流行。据曾任葡萄牙外长的法朗科·诺格拉博士所著《第三世界》一书中说，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于1956年首先使用了这个词。索维解释“第三世界”（法文为 Le Tiers Monde）一词是从“第三等级”（Le Tiers Etat）一词演译而来的。按在法国封建时代，教士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农民、城市贫民、资产阶级为“第三等级”。前两者为特权等级，而后者为被统治者。照法文《小拉卢斯辞典》1969年版所载：“第三世界”是所有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他们既不属于“自由经济”的工业国集团，

也不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集团。《大英百科全书》第9卷中说：“第三世界”，在50年代和60年代泛指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或非工业化国家。最早使用这个词起源于“第三集团”，以区别于共产主义和西方国家。美国的《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1975年版说：“第三世界”一词，意指亚、非、拉经济上欠发达国家，以区别于经济技术上先进的两类国家集团，一类是西方国家，主要受美国等国的影响；一类是苏联集团，主要受苏联影响。至于中国通常被划入第三世界国家，但在国际均衡中视为第四力量也许更较确切（笔者按：不确切）。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1966年所著《三种发展阶段的世界》一书则有下面一段论述：

“第一世界”是指美国统治的世界，包括其西欧盟国以及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卫星国”。

“第二世界”是指苏联统治的世界，历史上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包括其东欧和亚洲部分的盟国和“卫星国”。

“第三世界”是指在亚、非、拉地区的不结盟的非“卫星国”，通常包括，经济上从阿尔及利亚到南斯拉夫，政体上从印度到中国等各式各样的国家。

中国在地理、经济、社会特征等方面与“第三世界”有相同之处，要是选择这些因素作为标准的话，则中国不仅是“第三世界”的成员而且是它的领袖。（笔者按：成员是千真万确的，“领袖”一职则中国向无此意，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有人在这里面进行挑拨、做文章，所以有必要“按”上一笔。）但如以社会制度的特征作为主要标准的话，则中国属于东方集团。后来，与北约或华约没有组织上联系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认为自己是属于“第三世界”的。

从霍罗维茨教授上面这一大段论述来看，他不仅提出对“第三世界”的界说，而且也涉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了。

上述各家之言，对于何谓“第三世界”大致是相似的，或比较接近的。至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我们和霍罗维茨教授以及上引几部辞典或百科全书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这可能部分是由于实际历史已经有了变化发展的缘故。

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明确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或国际战略原则；这当然不是他随意提出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观察、深思熟虑、对于客观存在的当时和当代国际战略态势的一个科学概括。《邓小平文选》注释30（第378页～379页）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笔者按：这个注释的最后：“——第74、122、146页。”应增加158页。）这个注释虽然没有引用毛主席的原话，但是经过仔细对照研究，我认为它忠实地准确地概括了原谈话的主要精神和内容。

（二）

这里就要联系到一些问题和情况。

第一，有些苏联人埋怨我们：“你们怎么把我们和美国并列呀！”同样也有些美国人埋怨我们：“你们怎么把我们和苏联并列呀！”无奈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所能随意规定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公认的实际。只有你们两家“原子弹多，也比较富”，也就是“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只有你们两家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要是发动世界大战的话，也只有你们两家有资格。还有一点，也不妨先在这里提一提：有人说我们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实行“等距离”的平衡政策；我们说不对的，那样做是没有战略原则的。我们的原则是：你们哪一家在哪一个地区或哪一个